

中國方志叢書·第七十四號

據

清乾隆二十七年
清乾隆二十七年
光緒六年
重刊本

影印

福建省

福寧府志

(全)

成文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十二月臺一版

福寧府志

全一冊

定價：新台幣四〇〇元正

發行人：黃成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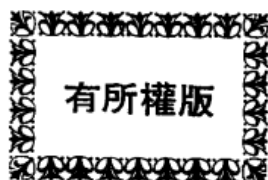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正大印製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说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俄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乖輓，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綬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阱，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盡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為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為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敘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為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賓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自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爲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爲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興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棟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旱稻稻種。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參考。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 往日的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 少數民族如苗、畲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爲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光緒庚辰
仲冬訖功

重刊福甯郡志序

州郡之志責在守土之人
歷年既久板籍散亡議增
修則力有未逮聽棄置則
心有不安不得已而補苴
之惟重刊為差善福甯舊

為州之有志自前明隆萬
以來百餘年未有修者我
朝雍正十二年升州為府志
仍沿舊乾隆己卯年川西
李君拔來守是邦始重修
之竭數歲之力而成區為

十二門條分縷析一變舊

志之陋疆域中增海防一
條詳攷而為之說當是時
國家承平海氛靖息而李君
拳拳加意於海防其思深
其慮遠矣同治甲子余權

斯郡求李君之志存本已
甚字畫又漫漶思增葺之
而不果去歲季春之閏奉
檄重来則原書僅存二三
部板已散失嗟乎余昔領
郡時至今十數寒暑耳而

遺失廢棄一至於此若復
數年併此僅存者而亦止
之後之人雖欲徵文考獻
按山川之險要為牖戶之
綢繆又將何所依據乎集
紳士而商之僉以經費告

大為辭又適修

文廟費已鉅萬勢難兼顧降思
其次乃有重刊之役以綿
前緒以貽後賢方策猶存
餽羊具在各守爾典慎固
吾圉庶亦有舉莫廢之意

歟原書多訛字別體勢不
能全改延友詳校擇其甚
者更正之疑者闕之不可
攷者仍之校既竣即以原
書貼板付鐫潤澤修明俟
諸君子

光緒六年歲次庚辰仲冬
中憲大夫權知福甯府事
會稽張其曜撰



重刊郡志後記

余既籌款影刊郡志將付
雕都人士言於余曰原板
多魯魚之舛今參互而致
訂之勝於舊僞造矣顧其
中尚有闕陷者不可以勿

福甯府志

重刊後記

一

正余亟請其說曰鄉先達
劉閣部中藻勝朝殉節之
名臣也向列諸忠義前太
守李公謂其抗拒
王師削而附諸祥異蓋屈抑
者百數十載於茲矣我公

扶持風教盡及時而釐正
之其罹竊維桀犬吠堯各
為其主

聖諭昭彰矧劉閣部仕明適丁陽
五艱難竭蹶始終一心其
馭軍有法士卒皆樂為用

福甯府志

重刊後記

二

尤能出奇制勝綜其生平
毫無遺議殉節後順治朝
特詔免追田產給留養孤雍正朝
詔修明史與錢肅樂鄭遵謙合傳
乾隆朝
賜謚烈愍

隆恩

曠典至再至三為臣子者應仰體
列祖教忠之至意悉力闡揚以厲

世而磨鈍敢以私意軒輊
其間乎遂允其請仍列忠
義加案語於祥異條並為

後記如右

福甯府志序

福甯界閩浙之交大海環
其南群山拱其北東西橫
亘瀋維千里秦漢為閩中
地晉稱溫麻唐置縣名長溪
隸泉州郡宋曰福安元升縣

為州是稱福甯屬福州路
明初改為縣後升為州統福
安甯德為屬邑

國朝撫有區夏海甸艾安隨地
制宜初因其舊雍正十二年
經國治官盡疆分壤視向之

建牧立監祗參傳伍陳殷置
輔者晉秩為府而以分設之霞
浦福鼎壽甯併隸焉所以需
責成重法守也

聖天子重熙累洽嘉惠元元教養
兼施綱維具舉百數十年涵

濡漸摩益黎樂利穡歟盛
哉定而以來未有志即前州
志固修自前代神宗時者稽
今且二百年其間沿革廢興
損益利弊版冊雖存於書缺
有伺矣哉丁丑蜀川李君來

守是邦政事克勤兼為博採以舊志年遠弗詳見聞湮失請增輯焉又明年庚辰調任福州李君曰自我始之死自我終之未敢棲為鄰封事也爰復精心校讎閱十有幾

月書成而李君適以憂去以橐致予且請為叙予閱江文通之言曰修史之難莫難於志鄭漁仲謂志者憲章之所賴必老子典故然後能為夫訂古證今徵文考獻不博則

不該不約則不法不嚴則不公與夫疑信相參繁畧相著均弗易言福甯一郡山有南金霍童川有藍溪蘄江勝槩可枚舉也仰官如王尹詹揭諸公或治行卓尔或大節

炳然並堪不朽人物之盛如薛令之楊復謝皋羽林莊敏諸君子同人踵起表揚宜亟目是志成而綜核精詳是以允協天時地利之宜禮樂兵農之大民藝物則之繁建置輕重之故

燦然大備一按牘而稽如身歷
如指掌也李君去矣後之觀
政采風者胥有取焉是有功
於福甯可為去後思也為之
序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九月吉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福建提
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加三級
合署福建布政使司事新建
曹繩柱拜撰



福甯府志序

福甯去福州東北五百四十餘里界以重嶺環海三面形勢奇險為閩浙之左塞余庚辰秋奉命來閩司糧驛兼巡福州福甯二郡既考圖籍獨福州有志成於今

運使錢塘徐公而福甯缺如詢之則自前明神宗癸巳歲迄今百七十年無繼修者時福州太守鍵為李君先自福甯移守於此間言曾手輯之有草本未成予勸君必成之然以為福

州首十郡日夜治事不得休豈

暇及此哉今年春君謂予曰某親老矣忽忽將告歸顧前所為福甯府志幸已成書請及今刻之以備遺忘余怪問其故何成之易也則君於聽訟決簿暇數

漏刻燭不假手於他人如是者十餘月而竣可謂勤矣出而讀之詳核賅善凡言形勝利病若道其戶內井竈鰥嫠緯繡無闕於口者偉哉真李君一家言也昔太史公作史記歐陽子作

五代史司馬溫公作通鑑皆本末條貫出於一手近之為書者摠萃參伍無所折衷又志書往往作於當事開館延客歷歲而成帙前後舛迕者不可勝指若君之勇於著述斐然獨繼百七

之有功而成之獨勤也故為序以告後之覽者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仲冬月長至後一日

賜進士出身福建糧驛道分巡福州福甯二府兼管水利加一級紀

錄八次前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大興朱珪撰